

话说

叶文宪 著

中国物质文化遗产



学林出版社

话说 中国物质文化遗产

叶文宪 著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话说中国物质文化遗产 / 叶文宪著.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 - 7 - 80730 - 736 - 5

I. 话... II. 叶... III. 文化遗产—简介—中国 IV. 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87870 号

话说中国物质文化遗产



作 者—— 叶文宪

特约编辑—— 任余白

责任编辑—— 钱丽明

封面设计—— 魏 来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64515005 传真:64515005

发 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1 楼)
电话:64515012 传真:64844088

印 刷——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 1020 1/16

印 张—— 23

字 数—— 30 万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730 - 736 - 5/G · 215

定 价—— 48.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序 话说文化

以前人们只是把读书识字叫做“学文化”，把知书达礼叫做“有文化”。而现在“文化”这个词用得实在是太广泛了：喝茶是茶文化，饮酒是酒文化，吃饭是饮食文化，穿衣是服饰文化，过节是民俗文化，歌舞是娱乐文化，道德是精神文化，享受是物质文化，识文断字是狭义文化，衣食住行是广义文化……“文化”简直成了一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那么，究竟什么是“文化”呢？

先秦时期所说的“文化”是“以文化之”的缩写，这是与“武力征服”相对立的一个概念，原来是指用“文”的方式与内容去感化他人。经过春秋战国的格斗较量，秦王政用武力实现了统一，“以文化之”显然已经迂腐过时，于是“文化”就变成了一种生活的样式。不过，这样一来倒和现代西方文化人类学学者提出来的“文化”概念有点类似了。

我们日常所说的“文化”其实包含着三层意思。

当我们说识字的人“有文化”、不识字的人“没文化”的时候，实际上是指“识文断字”，这是“文化”最浅近的意思，严格地说，识文断字是指受教育程度。当我们说文质彬彬是“有文化”、野蛮粗鲁是“没文化”的时候，实际上是指“知书达礼”，这是“文化”的第二层意思，严格地说，知书达礼是指人的品位教养。只有当我们把某种生活方式称作为“某某文化”的时候，例如考古学把一群遗存所代表的生活方式叫做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这是“文化”最深刻的含义。文化人类学所谓的“文化”，也叫做“文化模式”。不识字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新石器文化就没有文字；

野蛮粗鲁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旧石器文化就是野蛮人的生活方式，陋习就是一种粗俗的文化。随着动物行为学研究的日益深入，我们现在已经发现动物也有自己的生活方式，甚至同一种动物的不同群体也存在着生活方式的区别，于是有人把“文化”这个概念推广到动物界去运用了。

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化并不是指个体的，而是指群体的生活方式。个体的生活方式叫做“个性”，只有一群人共同的生活方式或一个社会存在的形式才能叫做“文化”，而这一群具有共同生活方式的人就叫做“民族”。因为文化是区别民族的标志，所以，如果一个民族丧失了自己的文化，那么这个民族也就消亡了，即使他们的后裔仍然生活在地球上，例如美洲的玛雅人，但是他们的后裔已经变成了别的民族的人。

我们常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任何一个民族只有保持自己独特的文化，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然而文化并不是僵死的，它和世界上所有的东西一样不仅在空间上存在着差异，而且在时间上不断地演变，但是文化在演变进化的过程中有一种万变不离其宗的东西，这就是传统。因此只有保持民族的传统，才能维持文化的独特性。

人们的生活方式包括许许多多方面，例如物质方面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精神方面的道德哲学、心理宗教；社会方面的家庭宗族、风俗习惯；政治方面的法律制度、政权国体；经济方面的生产技术、劳动组织；人文方面的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等，因此文化也就包含了这方方面面、许许多多的内容。

不同的人们结成了不同的社会，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写了一本巨著《历史研究》，他把全人类自古以来的文明社会划分为二十三个文化模式。作为一家之言，这当然只是一种粗线条的划分。由于在每一个社会中众多的人们又可以划分为宗族、民族、阶级、宗教、党派、集团等等不同的群体与层次，不同的群体与层次又有各自不同的生活方式，因此每一个文化都可以再细分为更多不同的类型与层次，我们称之为“亚文化”、“子文化”和

“文化层次”。

文化既然是人群的生活方式，那么它就必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兴盛、随着人群消失而衰亡。汤因比所说的二十三个文化模式大多已经消亡，只有五六个存留至今。文化有生有灭、有分有合，文化的发展取决于社会内部人们的变迁，文化的兴衰与其所属人群的兴衰存亡相伴随。

不同的人群具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具有不同的形态，就好比中国人说汉语、外国人说外语，中国人穿旗袍、外国人穿西装一样，它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先进与落后之分。当两个社会发生接触互相交往时，不同的文化之间就需要沟通——首先是语言的翻译，而当两群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时，不同的文化之间就会发生碰撞。不同的文化之间无论是善意的沟通还是恶意的碰撞，结果都会是错综复杂的：或者互相交流，双方取长补短共同发展；或者互相吸收融合，产生出新的文化；或者以强凌弱，一方覆盖另一方；或者排斥异己，一方驱逐、取代、置换另一方。交流与融合是一种互补，但是并不意味着输出文化者先进、输入文化者落后；覆盖与置换是一种竞争，但是并不意味着胜利者先进、失败者落后。

每一个民族都对自己的文化充满了自豪感，人们总是以为只有本民族的文化最伟大、最文明。当人类还处于比较幼稚的时代，人们总是企图用自己的文化去规范别人，而当人类逐渐成熟以后他们才慢慢地意识到，世界是不可能整齐划一的，同一与分化总是互相依存、形影不离的，人类的文化将会永远保持其多样性。具有不同文化的人们、文化不同的社会之间要学会跨越文化进行沟通，不同的人群与社会都要和谐相处，一个“和谐”而不是“同一”的世界才是最美好的世界。

目 录

| | | |
|----|-----------|-----|
| 序 | 话说文化 / | 1 |
| 一 | 简牍卷编话书籍 / | 1 |
| 二 | 食案曲几变桌椅 / | 16 |
| 三 | 烧菜做饭话炉灶 / | 23 |
| 四 | 推杯换盏说酒具 / | 28 |
| 五 | 饮茶品茗话茶具 / | 38 |
| 六 | 壶的来历与演变 / | 43 |
| 七 | 秉烛持灯话照明 / | 51 |
| 八 | 屏风帷帐架子床 / | 61 |
| 九 | 香烟缭绕话熏炉 / | 69 |
| 十 | 以铜为镜正衣冠 / | 75 |
| 十一 | 拂暑遮阳话扇子 / | 87 |
| 十二 | 痒痒挠与挖耳勺 / | 93 |
| 十三 | 人见人爱说玉器 / | 98 |
| 十四 | 红灰黑白话陶器 / | 113 |
| 十五 | 第五发明谈瓷器 / | 129 |
| 十六 | 雕红剔犀谈漆器 / | 143 |
| 十七 | 鎏金错银说奢华 / | 150 |
| 十八 | 琢石澄泥成砚台 / | 158 |
| 十九 | 烟熏火燎话古墨 / | 163 |
| 二十 | 四宝之外说八宝 / | 167 |




| | | |
|------|-----------|-----|
| 二十一 | 博戏手谈说下棋 / | 171 |
| 二十二 | 金戈铁马话兵器 / | 179 |
| 二十三 | 纵横交通话车辆 / | 194 |
| 二十四 | 漂洋过海话舟船 / | 205 |
| 二十五 | 饮水思源说水井 / | 213 |
| 二十六 | 稻麦粟稷话主食 / | 218 |
| 二十七 | 青菜豆腐话副食 / | 226 |
| 二十八 | 襦裙袴褶话服饰 / | 236 |
| 二十九 | 夜壶蹲坑话溷厕 / | 252 |
| 三十 | 秦砖汉瓦话建筑 / | 256 |
| 三十一 | 破墙开店说市场 / | 270 |
| 三十二 | 方孔圆钱说货币 / | 274 |
| 三十三 | 街坊里巷话城市 / | 289 |
| 三十四 | 清明上坟话墓葬 / | 305 |
| 三十五 | 树碑立传话志铭 / | 329 |
| 三十六 | 慎终追远话肖像 / | 337 |
| 三十七 | 由强变呆话石马 / | 343 |
| 三十八 | 时代风貌看石狮 / | 349 |
| 参考书目 | / | 353 |
| 后 记 | / | 354 |



一 简牍卷编话书籍

书籍的出现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有人把刻有卜辞的甲骨、铸有金文的铜鼎和镌刻文字的石碣称为最早的书，这是不妥当的，因为文字的发明不等于就有了书籍，书籍的出现比文字的发明要晚得多。虽然书籍不一定要用纸印制而成，但是这些甲骨、铜鼎、石碣之类还不能称之为书。

我国最早的书大约出现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商代人用甲骨来记录占卜的问辞和对卜象吉凶的判读，而日常书写记录并不用甲骨，而是用竹木制成的简策。《尚书·多士》篇称：“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甲骨文中的“册”字写作, 就像用绳子穿缀竹筒的形象，“典”字写作, 像双手捧竹筒的形象，甲骨文中另有一个“史”字，写作, 是手握一个插竹筒的架子以备记录的形象。先秦时期官方文书都用简册，任命官员、分封诸侯都要记录在简册上，所以称之为“册命”，而主管此事的官员就叫做“作册史”。因为竹筒容易朽烂，所以商代的简册一片也没有保存下来，我们现在无法知道它的端详了，但是汉代的竹筒现在还能够见到（图1），两者应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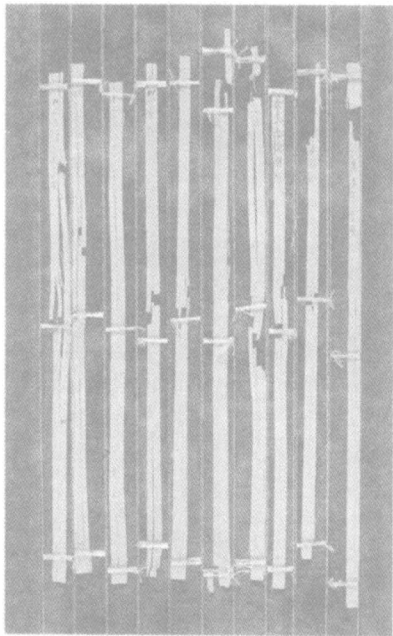


图1 汉代竹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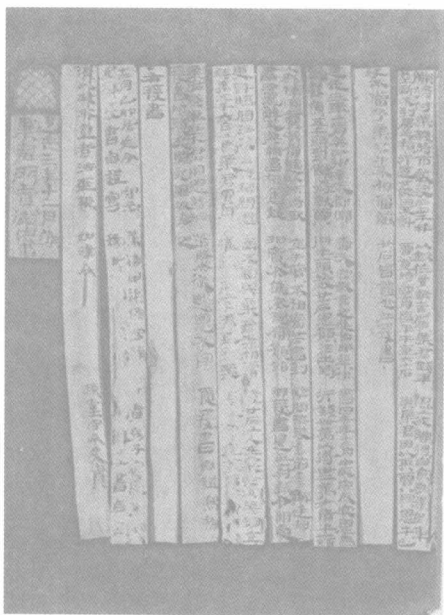


图2 西汉简册



图3 春秋金首铜削（上）和装在刀套里的汉代铜削（下）

相仿。

由于一支竹简最多只能写几十个字，写一篇文章需要许多支竹简，因此就要将其编连在一起，用绳索把竹简编连起来就成为“册”（图2），也叫做“策”。《释名》解释说：“策字同箒，象形也，盖将众竹简连贯编缀之意。”“册”是象形字、“策”是形声字，两字音同义通。简册是最早的书籍，所以我们现在把书籍的单位叫做“册”。慎重地用双手捧到祭坛上的简册叫做“典”，所以我们现在把珍贵的书籍叫做“典籍”。

编连竹简一般用线绳，所以文章和书籍的单位又叫做“编”或“篇”，这两个字都是形声字，前者从糸，后者从竹，也是音同义通。一篇文章或一篇书其实就是一捆竹简，而为了阅读方便，一篇文章的长度不能太长，而一部书则往往要分为若干编，也就是需要一大堆竹简。在用竹简写书的时代，文章的篇幅一般都比较短，但即使如此，书还是非常笨重。《庄子·天下篇》说“惠施多方，其书五车”，意思是说惠施很有学问，他的书可以装五大车，

于是就留下了一句成语：“学富五车”。还有一句成语“衡石量书”，也是同样的意思。

用绳索编连的书籍经常翻阅以后绳索容易被磨断，绳索断了竹筒就容易散失，而重新编连则有可能搞错，现存古籍中有些文字错乱的现象就是由于古代脱筒、错筒而造成的。为了使简策不容易散失，有些考究的书籍就用皮条来编连竹简，叫做“韦编”，它们就好比今天的精装书。《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连牛皮绳都多次断绝，可见孔子读书之勤奋。

从出土的实物来看，竹筒的长短不一，长的可至三尺，短的只有五寸，一般一支筒上写一行字，也有写两三行的。把新鲜的竹子加工成竹筒，先要将其烘干，水分从竹子里渗出来就像出汗，所以叫做“汗筒”，又要刮去青皮，这叫做“杀青”，所以竹筒也叫“汗青”。在竹筒上写字，如果写错了可以用刀削去重写，这种削竹筒的小刀就叫做“削”（图3），或者叫做“书刀”，所以，古代把删改文字叫做“笔削”，而把文书叫做“刀笔吏”。

竹子是筒形的，只有劈开削平后才能制成竹简，所以竹简只能是窄窄的一条，而如果用竹筒来画图的话就要用许多支竹筒连在一起（图4），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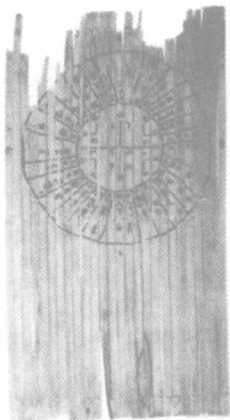


图4 画有式图的秦简



图5 天水放马滩出土的战国木地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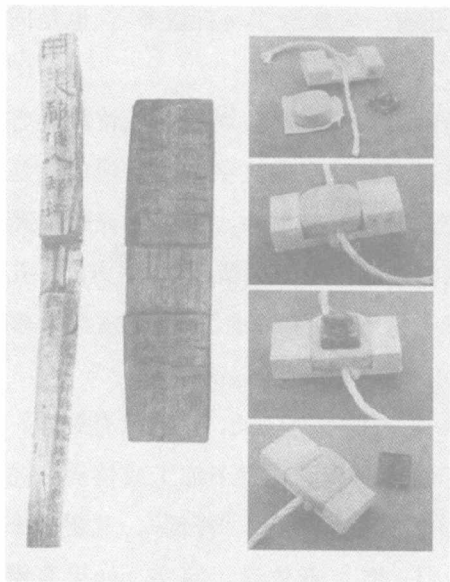


图6 居延出土的汉代封检（左、中）和封检过程示意图（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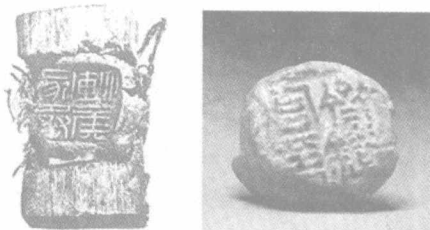


图7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封检与上面的“侯家丞”封泥（左）汉代“齐铁官”封泥（右）

不方便，因此通常就把图画在木版上，叫做“木牍”（图5）。木版可以做得比较宽，所以又被称为“方策”、“版”或“牍”。宽大的木版可以画地图，所以地图也称为“版图”。木牍较宽，一块木牍上面可以写较多的字，用来写信，一块就够了，木牍又比竹筒更容易封缄，所以木牍常常被用来作为书信。用作书信的木牍长约一尺，故称“尺牍”。在木牍上写完信后，再在上面加上一块板，叫做“检”，检上可以署名（图6）。两板相合，用绳子捆扎好，再在绳结处加按一小块黏土，然后在黏土上按盖印章，称为“封检”。加盖印章用的黏土叫做“封泥”。封泥干燥后非常坚硬，在地下埋两千年依然坚硬如故，在考古发掘中仍能被发现（图7）。

木牍还被用来作为名片和登记户口。

汉代的名片叫做“谒”，《释名》曰：“谒，诣也；诣，告也。书其姓名于上，以告所至诣者也。”1984年在安徽马鞍山发现的东吴将军朱然墓中出土了三枚谒。这三枚谒是用木片做成的，长24.8厘米，宽

9.5 厘米，厚 3.4 厘米，谒面顶部中央写一个“谒”字，右边直行墨书：“□节右军师左大司马当阳侯丹扬朱然再拜”，谒面有一大片空白，这是书写礼金数量的地方。《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刘邦在沛县当亭长时有一次和朋友一起到吕公家去贺喜，因为没有带钱而不得上堂入座，刘邦便假装“为谒曰：‘贺钱万’，实不持一钱。谒入，吕公大惊，起，迎之门”。谒是下级对上级、晚辈对尊长通名时用的名片，通常用于比较庄重、正式的场合，平时在亲朋同僚之间使用的是一种比较简易的名片，叫做“刺”（札）。刺因“书以笔刺纸、简之上”而得名。朱然墓中同时出土了十四枚刺，也是长一汉尺左右的木片，但宽仅 3.4 厘米，厚仅 0.6 厘米，既薄又窄。刺面从上到下有一行墨书：“故鄣朱然再拜 问起居 字义封”，刺的内容比谒亲切得多，刺面也没有可以写字的空隙（图 8）。由于刺比谒更轻巧、灵便、实用，在使用的过程中刺逐渐取代了谒。刺在东汉时已经十分流行，《梁书·诸葛璩传》中也有“投刺邦宰”的话。隋唐以后纸张普及了，名刺不再使用木牍而改用纸张来书写了，于是它的名称也就改称为“帖”，“投札”就变成了“投帖”。但有意思的是刺传到日本以后也被日本人所接受，他们至今仍把名片叫做“名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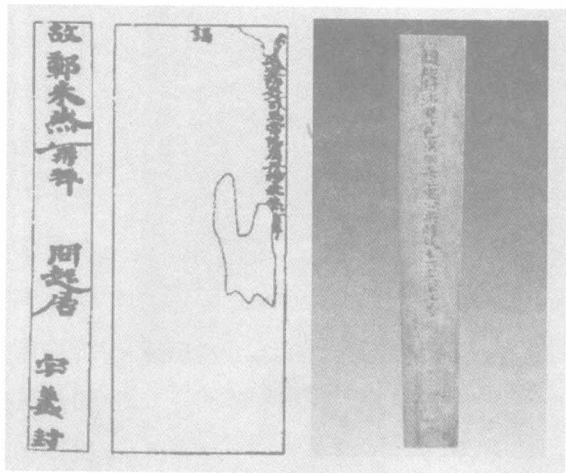


图8 三国东吴朱然木札（左）和谒（中），薛秋名刺（右）



图9 汉代户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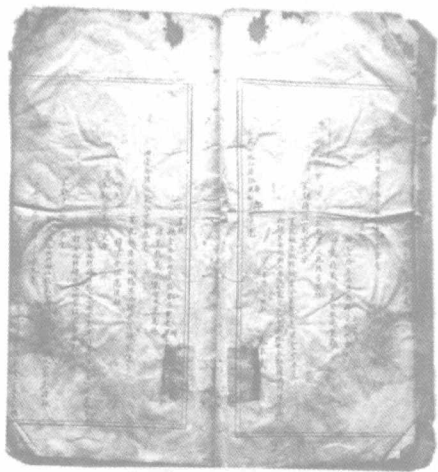


图10 明嘉靖四十年严州府遂安县黄册原本之一页

登记户口的做法最早可以上溯到周宣王“料民于太原”，春秋战国时期的“书社”也是登记户口。杨惊注《荀子·仲尼》云：“书社，谓以社之户口书于板图。”因为户口是记录在简牍上的，所以叫做“户籍”。又因为户籍的内容是一连串信息，就像用绳贯穿在一起，所以也叫做“籍贯”。先秦时期的户籍已经见不到了，汉代的户籍其实就是一块木牍（图9）。东晋时分别用黄纸和白纸来登记户口，叫做“黄籍”与“白籍”。明代叫做“黄册”（图10），既是户口本，又是纳税的依据。

战国秦汉时期人们主要用竹筒木牍来书写写信，所以那时的文具盒和里面所放的文具与现在大不一样。1957年在河南信阳长台关1号楚墓中出土了一只放文具的小木箱，大小和现在的鞋盒差不多，里边放着十二件文具，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加工制作竹筒用的工具，如截断竹筒用的铜锯，劈开竹筒、刨平竹片用的铜铍，刮除茸毛、修整竹筒用的铜刻刀和铜夹刻刀，钻孔编册用的铜锥等；另一类是书写文字

用的笔，装笔的笔套，还有刮削竹简、改正笔误用的铜削刀。除了毛笔以外，整体上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一盒工匠用的工具。1965年湖北江陵望山1号楚墓出土了一只盛放制作简牍工具的小木盒，里面除了铜铍、铜刻刀、铜夹刻刀外，还有两块砺石。1981年在浙江绍兴坡塘狮子山发现的战国墓中，与铜铍、铜刻刀、铜削、砺石共出土的还有陶线锤，这是拉线编织简册时用的。由此可见，在战国时期的文具盒里用于制作简牍的工具比书写文字的文具要多得多。1954年在长沙左家公山的楚墓中出土了一个小竹筐，里面盛放着一支套在小竹管内的毛笔、一把铜削、一个小竹筒，估计是用来贮放墨块的，还有二十五支尚未用过的竹简，全部都是文具，没有制作简牍的工具。在居延烽燧遗址出土的木简上曾经发现过有“出钱六十二，买槩二百”的记录。“槩”是木牍的半成品，说明到了汉代，在市场上竹筒木牍已经有作为商品供应的了，这样，文具盒内只要放文具就行了。1975年在湖北江陵凤凰山168号汉墓中出土了一个小竹筒，里面放着一支套在小竹管内的毛笔、几块墨、一块砚板、一块研石、一把铜削刀和六块无字木牍，这样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汉代文具。战国时洛阳人苏秦求官不成，回家受到家人的奚落，于是便夜以继日地发奋学习，“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这锥子原来就是放在案头文具盒里用来编竹简的文具，垂手可得，并不是特意找来刺股的。

中国历史上使用竹简木牍的时间很长，从商代一直延续到东晋。汉晋时期曾经两次出土过大量古代的竹简：一次在汉初，鲁恭王拆孔子旧宅建花园，在夹墙中发现大批写在竹简上的儒家典籍；另一次是晋太康二年（公元281年），汲郡人石准盗掘魏襄王墓，得竹书数十车。不过这些古代出土的竹简现在已经见不到了。虽然竹简不易保存，但在考古中还时能发现战国秦汉时期的竹简，其中重大的发现就有20世纪30年代在甘肃居延出土的汉简（图11）、70年代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图12）和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汉简（图13）、90年代在湖南长沙走马楼出土的三国吴简



图11 居延出土的东汉建武三年竹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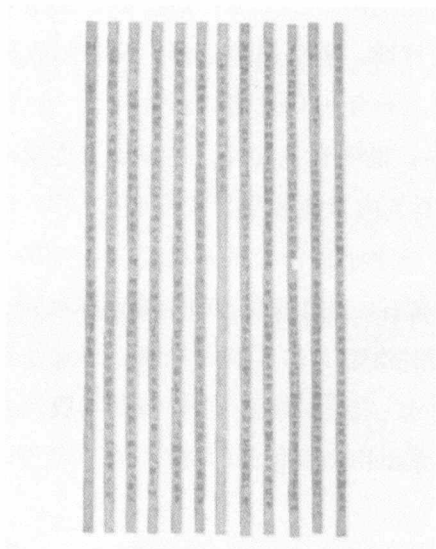


图12 云梦睡虎地秦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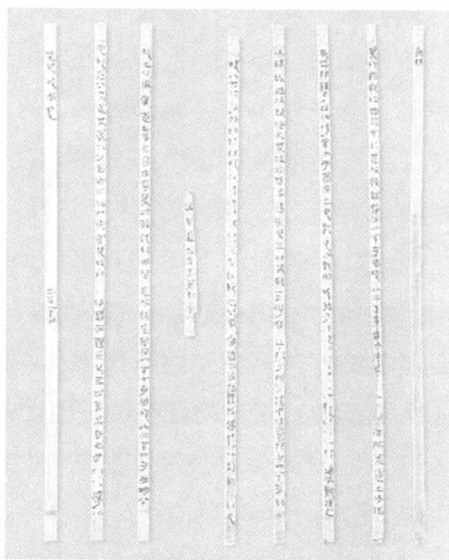


图13 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汉简

(图 14) 和 21 世纪初在湖南湘西里耶出土的秦简 (图 15)。

由于竹简木牍过于笨重，因此在使用简牍的同时人们也用缣帛来做书写的材料，用缣帛书写的书籍称为“帛书”。墨子云：“书于竹帛，镂于金石。”1929年在长沙子弹库出土了一件战国帛书，形如手帕，有字有画(图 16)，虽然只有一幅，但这是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帛书，可惜后来流入了美国。“文革”中在长沙马王堆 3 号汉墓出土了汉代的帛画，还有大批帛

书（图 17），其中包括多种现在已经失传的佚书。出土时帛书被整齐地叠放在木匣内。陈胜吴广起义时搞“鱼腹丹书”的把戏，就是用朱色写在缣帛上塞到鱼肚子里去。用缣帛写的书可以卷成一卷，所以帛书也被称为“书卷”、“手卷”、“卷子”，于是“卷”也就成了书的数量单位。由于书的内容有长有短，因此书卷也有大有小，但是太大了不便卷舒，所以要把一部书分为若干卷；太小了又不能成握，所以要把数篇合为一卷。为了便于检索成卷的书籍，在卷口要用竹签做成的签条做上标记，叫做“籤符”。尽管帛书轻巧方便，但是毕竟过于昂贵，使用的范围十分有限，而且缣帛比竹简更不容易保存，所以流传下来的更少。

相传是东汉的蔡伦发明了造纸术，实际上考古工作者在西安灞桥，甘肃居延、敦煌等地已经多次发现过西汉时期的纸张残片（图 18），只不过西汉的纸质地粗糙，只能用来包裹物品，还不适合用于书写。所以，所谓“蔡伦造纸”，应该是指他对造纸原料的选择与技术的改进



图14 长沙走马楼出土吴简

图15 湖南湘西里耶出土的秦木牍乘法口诀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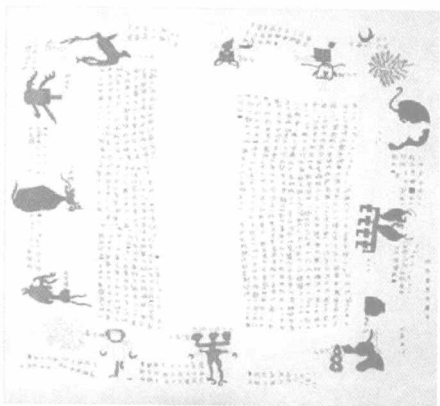


图16 长沙子弹库出土的战国帛书